

SHIJIE
RENXUE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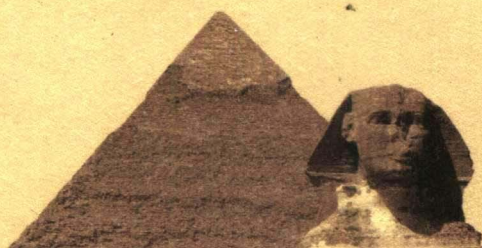


世界人学史

第一卷

主 编 孙鼎国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人学史/孙鼎国主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 - 202 - 03268 - 6

I. 世… II. 孙… III. 人学-思想史-世界

IV. C912.1 -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551 号

书 名	世界人学史(1—4 卷)		
主 编	孙鼎国		
责任编辑	李保平	董宝生	李剑霞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939×636 毫米 1/16		
印 张	129.25		
字 数	1661000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 - 202 - 03268 - 6/B·164		
定 价	2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论

世界人学史，就是世界各国人学思想产生、演变、发展的历史。从上古人类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人学思想萌芽为开端，一直到现代的各种人学思想流派，绵亘几千年。

“人学”一词是拉丁语“anthropologia”一词的中译。在欧洲其他文字中，例如英、德、法、俄等，全部是直接音译这个词。这个术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1596年，新教人文主义者卡斯曼用这个词作题目出版了一本著作。他认为，“anthropologia”是关于人的两重本性的学说，是对人的心理物理两重本性的研究。这一术语后来被用来标识18世纪下半叶形成的一门科学，中文称之为“人类学”，划归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它以人类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大部分。实际上，从语源学上讲，“anthropologia”是研究人的科学。因为“anthropologia”一词就是由希腊文“anthropos”（人）加上“logos”（学说）构成的。卡斯曼最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近几十年国内外兴起的“人学”，其对象、性质、内容不同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人类学”。为了区别两者，西方学术界有人主张用“homonology”称“人学”，以区别于“anthropologia”（“人类学”）。在西方一些学术著作中，例如埃利希·弗罗姆在《自为的人》（Man For Himself）一书中，“人学”写作“science of man”（中文有人译作“人学”，有人译作“人的科学”）。他们指出，人学与人类学不同，“人学”所涉及的范围比习惯上的“人类学”概念更为宽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过“Wissenschaft Von Menschen”，这个词组有人译为“人学”，有人

译成“人的科学”。但是马克思本人没有对这门科学的对象、性质、内容做出明确规定。

对于人学的性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看法不尽相同。一种意见认为,人学从根本上说来,是社会科学。理由是:人虽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但自然属性只是人的自然前提,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且它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将要建立的统一人学,是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立的独立科学。自然科学以自然为对象,社会科学以社会为对象,而人学以整体的人为对象,力图正确而完整地理解人这个有机系统。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人学是一门综合科学,是对从不同方面研究人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是对人的科学的综合研究。其实,本世纪最早提出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他晚年创立的学派“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中文通常译作“哲学人类学”,实际上译为“哲学人学”更为贴切。因为舍勒的目的,是想把不同学科对人的具体研究同对人的总体的哲学理解结合起来,把生物学、心理学、人种志学、文化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具体研究成果,系统化成关于人的哲学学说。针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和历史上的对人的片面理解,他指出:“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续的关于人的观念。”因此,他主张哲学的最终问题,是哲学人学这一课题。他说:“如果存在着一个在我们的时代需要拼命地寻求其答案的哲学任务的话,那么,它就是一门哲学人学的任务。我指的是一门关于人的本质和构造的基本科学。”他把哲学人学看做其他一切科学和哲学的基础,称之为元科学、元哲学。

关于人学的主要内容,有人认为包括两部分:作为整体的人 and 人的本质。前者指全部现代科学提供的人的完整图景,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历史、人的个人生活、人的社会生活等;后者指人

的本质及规律性,包括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未来和发展。也有人认为,人学的主题就是人的本性,但这门科学不是从圆满而充分的人性图景出发,不是把圆满而充分的人的本性作为前提,而是把他当做目的。他们主张观察人对各种个体、社会的反应,通过对这些反应的研究得出关于人的本性的推论。他们认为,人学同科学一样,是一种可以从人的行为的经验研究中推论出来的理论构建。

我们在本书中使用的“人学”,实际上是在“哲学人学”的意义上使用的,即它是一部世界哲学人学史,包括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在哲学高度上关于人的各种观点、理论的总汇。内容包括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个人生活的意义、人生目的、人道观、人生观、生死观、苦乐观、义利观、荣辱观、美丑观、幸福观、爱情观、友谊观等等。

人类对自身的明确认识,或者确切地说,人类对于正确认识自身的任务的提出,乃是在人类出现相当长时间以后的事,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人类认识的第一个对象是自然。这不仅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其诞生之地,更重要的还在于自然是人得以生存的基础,人不认识自然,不与自然打交道,便无法生存。因此,在人类理性认识发展的途程中,最先从经验上升为科学的是自然科学,而最初出现的哲学是自然哲学,对于社会、人自身的哲学认识是在此之后的事。从哲学意义上,明确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在中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从此以后,人学思想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变革,随着人类文化的进化和演变,经历了一系列迂回曲折的发展历程。虽然同哲学思想一样,人学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但是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文化与时俱进的持续演变,才构成人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人对自身的认识,永远不会超过时代提供的认识条件。因此,我们力求将人学发展的线索,放在世界史、世界文明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勾画出世界范围内人学思想发展的大概历程。由于人学、人学史是一门新学科,我们的研究水平有限,掌握的资料

不全,目前只能以各地区主要国家作代表,而不能面面俱到。例如,在东方,我们挑选了中国人学、阿拉伯人学、印度人学、日本人学为代表。在西方,以不同时代的主要国家的人学思想为代表。拉丁美洲、非洲(古埃及除外)、大洋洲、东欧(俄罗斯除外)的人学思想只好付诸缺如。

本书将世界人学思想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即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从有文字记载的人学思想萌芽起,到封建制度确立为上古时期;封建制度统治时期为中古时期;从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统治确立,到19世纪末为近代;从20世纪开始为现代。这样划分阶段,在不同国家里便造成不同的断代线。有些国家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很早,而结束封建统治又很晚,例如中国;有的国家很晚才建立封建制度,例如日本。因此,在不同国度里人学思想的发展阶段的划分,就不能像世界通史一样,单单以时间向量作统一的划分标准。我们之所以把社会形态的演变作为人学思想史的断代依据,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基本矛盾不同,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造成的不同社会存在,制约着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人学思想。相反,相同社会形态下的人学思想,则表现出某些类似的内容和特征。例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学思想,在各国不同代表人物作品中,反映出同一的主题:对禁欲主义的抨击,人性的觉醒与复苏。

人类自300万年前真正形成以来,经过漫长的发展,到公元前四五千年时,终于实现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中心出现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的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经的区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的后半期至3000年初期。接着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出现了三个文明中心,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中期至末期。在这些地方形成人类的古代文明,出现了第一批国家。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五大古代文明。

古代埃及最初的文明即拜达里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

这时埃及社会还处于氏族原始公社时期，人们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大约在公元前 3500 年到公元前 3100 年的格尔塞文化时期，埃及人从野蛮进入文明，标志是象形文字出现。发明了冶炼金属的技术，各种金属工具出现，劳动工具的改进、灌溉和耕作技术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私有财产出现，氏族制度逐渐瓦解，国家逐步形成。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早在公元前 4000 年，埃及人就发明了文字。最初的文字是象形字，后来演化为表意字，进而出现了字母文字，腓尼基人在埃及人 24 个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 22 个字母，这便是后来的希腊字母、阿拉米字母系统的来源。他们把天然纸草经过加工做成书写用的纸张，古埃及的各种文献就是写在这些纸草上或刻在石碑上留传下来的。古埃及人在金字塔、迷宫、神庙等建筑上表现出的高超建筑技巧，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在黄金制品、布物上表现出的精湛工艺，令今天的能工巧匠叹服。在生产实践中，以尼罗河的泛滥为标志，古埃及人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太阳历：一年分为三季，即泛滥季、耕作季、收获季，一季 4 个月，一年共 12 个月，每月 30 天，岁末增加 5 天节日，共计 365 日。现今世界各国通用的“公历”，其源头就是这个古埃及人创造的历史。古埃及人在生产实践中还积累了大量的数学知识，特别是几何学知识，这些知识最终传遍了全世界。他们在实践中还积累了大量的医学知识，特别是制作木乃伊的实践使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解剖学知识。古埃及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古代文学，从古王国时期出现最初的文学作品以来，在近 3000 年的历史发展中，古埃及人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体裁包括神话、传说、箴言、诗歌、训诫、咒文等等，其中的《伊浦味箴言》、《阿顿颂诗》不仅是埃及古代文化的珍品，也是世界古代文化中的珍品。古埃及的人学思想萌芽，就包含在埃及的古代文化中。

在古埃及的文学、艺术、建筑作品中，包含着古代埃及人对于人的初步认识，即人学思想的萌芽。威尔·杜兰先生在论述古埃及文

化的时候,说过一段十分准确的话:“埃及的一切,彻里彻外可说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埃及,除道德外,文学、艺术、政府,以及一切的一切,莫不受到宗教的影响。我们可以说,你不研究埃及的神,便休想了解埃及的人。”^① 由于宗教的影响,古埃及人对人的看法,如同隔着一层迷雾,总是模模糊糊、迷迷糊糊的。此外,他们对人的观察还停留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得的经验和教训上,没有也不可能对人作独立、深刻而严谨的哲学思考。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古埃及没有人学,只有对人模糊、肤浅、朦胧、粗糙的思想萌芽。古埃及人的神话传说与宗教崇拜交织在一起,神话传说中的主人公既是神又是人,彼此很难分清,正如威尔·杜兰所说:“在埃及,与其称之为人格化的神,不如称之为神化的人。……埃及的神,也都是许多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单有血有肉,有爱有恨,而且,也会吃饭睡觉生孩子。不特如此,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和人一样,还有老和死等着他们。”^② 古代埃及的文化遗产证明,古埃及人已经形成了灵魂、冥世、人心、罪恶等概念,同时也形成了关于社会分为高贵和低贱的不同等级、社会生活中应遵守的伦理道德、生活中应追求的目标等思想观念。蜚声世界的金字塔是法老死后的生活居所,仿照法老生前宫廷的布局,将尸体造成木乃伊是使法老长生不死的方法,放入坟墓中的亡灵书是为死者死后面对大神自我辩白用的,这些东西反映出古埃及人已经形成关于冥世、灵魂不死等观念。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不仅借助雄狮反映法老的沉着、勇敢、威严的特性,而在人面上那似有似无的微笑,也反映出法老猜疑的特点和对人性的认识。在关于太阳船的传说和对日神的颂诗中,古埃及人表明了他们关于人的起源的看法:人是太阳神创造的。起初太阳神创造的人不分男女都非常完美,他们愉快地生活。可是,人一代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遗产)上卷,东方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② 同上书,第239页。

一代传下去后，逐步变坏了，太阳神震怒了，于是造成千百万人死亡。古埃及人也有另一种看法：人类祖先起初与野兽并无二致，语言、文化乃是后来逐渐慢慢形成的。在古代遗留下的各种诗歌、世俗的文献中，反映出古埃及人对家庭、女性、爱情的看法。父亲教育儿子要孝敬母亲，因为他的每一步成长都沐浴着母亲的辛劳和关爱；要善待妻子，与之和睦相处，这是兴家之道，否则便是败家之途；要慎重对待女性，对那些品性不好的女人不可接近，因为她们会使你陷入灾难。古埃及人歌颂和赞美爱情，为了爱不惧鳄鱼满江；除了爱情，什么都可以抛弃。古埃及人留下的道德训诫，时至今日仍然有现实意义。如“别贪恋他人寸土，别行经寡妇门口”、“粗茶淡饭心安理得，胜于家财万贯愁眉苦脸”。“宅心仁厚，人必乐与之交”，为人要谦虚、谨慎，不可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忠言比翡翠珍贵。“做人应堂堂正正；世间最可贵者为德性而非珍宝”等。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古埃及教师教育学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有这些从社会生活中概括出的人生哲理，都是古埃及人对人和人际关系的抽象思考，虽然它们仍然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

古代另一个文明中心在巴比伦。巴比伦人通过神话的形式猜测人类的起源：人像草似的从地上长出来；人是神用神的血与土掺和在一起的泥做成的。他们认为神与人是相互依赖的：神创造人、保存人是为了让人崇拜、祭祀它们；而人侍奉神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恩惠和庇佑。古巴比伦人认为，天人相互对应，世上人的命运与天上星辰的位置分布相关，所以通过观察天上星斗的分布可以预测人事的兴衰。这是古巴比伦占星术起源的思想基础。古巴比伦人也有人死后去阴间的概念，但没有死后上天堂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天堂是神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没有永生的概念，没有关于最后审判的说法。在对话式的诗作《主人与奴隶的对话》中，表现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相互对立的思想感情，反映了奴隶追求平等的思想萌芽。在英雄史

诗《吉尔伽美什》^①中，既表现了人性中的善与恶，也表现了人与大自然的抗争。表明人不可能长生不死，但个别有功于人类的人是长生不灭的。总之，从我们所了解的古巴比伦残缺不全的文献中反映出的上古时期巴比伦的人学思想，如同古埃及的一样，是零碎的、肤浅的。但是由于宗教色彩没有埃及人那样浓厚^②，所以古巴比伦的人学思想也不像古埃及人学思想那样朦胧、玄奥。

古印度文明最初出现在印度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 2500(或 2300)年至公元前 1750 年。但上古印度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是从吠陀时代开始的。吠陀时代大约从公元前 12 世纪开始，延续到公元前 6 世纪。吠陀时代是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创造的，其所以叫“吠陀”，是因为这一时代的历史主要由婆罗门教的圣书《吠陀》和解释《吠陀》的诸《梵书》记述的。

在上古时期的印度社会中，与众不同的是它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最初产生于原始公社解体、奴隶制产生的时代。当时在自由的雅利安人中出现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祭司，即婆罗门；第二等级是刹帝利，是由部落首领和贵族组成的武士；第三等级是吠舍，是雅利安人的一般公社成员；第四个等级是由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组成的首陀罗，是最低的等级，他们或是独立的劳动者，或是奴隶。这种等级的划分，是与神话传说相联系的：诸神分割原始巨人普鲁沙时，其身体的不同部位转变成四个不同的等级，其口转为婆罗门，其双臂造成罗惹尼耶即后来的刹帝利，其双腿变成吠舍，双脚生出首陀罗。这样，四个等级便是与生俱来世袭不变的等级。这种种姓制度与奴隶制度既相联系又有不同。一般说来，奴隶主

① 《吉尔伽美什》是古巴比伦时期的一首长诗中的主人公，他是苏美尔的一个国王，后来在巴比伦的传说中成了一位神祇。依照威尔·杜兰的说法，苏美尔王国在公元前 6000 年就存在了，是世界文化最早的发源地。（见《世界文明史》第 1 卷，第 138~159 页）

② 威尔·杜兰说：“巴比伦人，似未建立灵魂不朽说。他们的宗教，是极端现实的。巴比伦人也祈祷，但他们所求的是现世福祉而非永生。神在他们看来并不比坟墓可靠。”“巴比伦宗教在道德方面，对人民显无影响。”（见《世界文明史》第 1 卷，第 288、294 页）

要由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中的一些大商人组成；而奴隶由首陀罗和贫穷的吠舍中的一些人组成。在帝国时代印度的种姓制度达到了森严的程度，并有法律文件加以固定，法律保护高种姓的特权。这种独特的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印度文明如同古埃及文明一样，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加之印度是一个宗教情感很强烈的民族，在那里，没有宗教意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特征也反映在古代印度人学思想上。这不仅表现在古印度的人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宗教经典中，而且对人的看法也是通过对神及其生活的看法中曲折地表现出来的，虽然在奥义书中已有了比吠陀更明显的理性倾向，但是如同古埃及一样，古代印度只有对人零碎的肤浅的、朦胧的感性认识。古印度人学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即吠陀时期和史诗经书时期的人学思想。

《吠陀》是雅利安人的圣书，共分四部，吠陀的意思是知识。最早的是《梨俱吠陀》，成书于大约公元前 12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间，它反映的时代是早期吠陀时代。另外三部是《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闳婆吠陀》，合称后期吠陀，成书于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前 800 年间。此外还有阐释《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大约编成于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600 年间。吠陀时期的人学思想就包含在上述诸书中。在这些书中，古印度人猜测了人的起源，形成了灵魂的观念，并把它赋予自然界，把自然力人格化，他们也对社会生活中人的等级分划加以神话的解释。吠陀对印度人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各派之间的思想斗争，常常是围绕如何解释吠陀展开的。

古印度人学较系统的论述始于奥义书。在奥义书中已经开始用理性思维的方式探讨人的本质、世界的根源、人与神和自然间的关系、灵与肉的关系等。它既把“梵”当成世界之主、主宰世界的最高力量、生命的本原，又认为梵我同一，梵是个人，大宇宙和小宇宙是统一的。古印度人已有灵魂不死、世代轮回的思想，也有了天堂和地狱的观念，他们论证说，现世人的业和报应决定人死后是上天堂还

是下地狱。而要解脱轮回之苦，就要在现世生活中苦行、布施、正行、禁杀生、禁欲、实语、同情等。这样，奥义书就把古印度人的现世行为，始终与来世挂起钩来，使人的一切行为都以宗教的信条为依归。这一传统给印度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当然，这个时期也产生了与吠陀思想相对立的主张。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的邬达逻迦，就提出“吠陀是无用的，自制的道路才是真理”的主张，向吠陀的权威以及依仗吠陀作威作福的上层祭司挑战，他代表的是下层祭司、武士和商人的要求。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左右，印度出现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沙门思潮。沙门思潮在灵肉关系、人生目的、死后有无意识等问题上，提出了与婆罗门教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并由此组成不同的僧团和派别。沙门思潮对印度人学的发展起到开拓性的推动作用，为后来印度人学思想的丰富、多样化做出了贡献。“六师”就是沙门思潮中的代表。他们生活在释迦牟尼活动的时代，都出身于下层阶级。他们反对吠陀权威和婆罗门教的观点，相信自然规律比神的创造更重要，在生活中人的知觉经验比吠陀更有效。他们反对业报轮回，主张人通过努力获得现世的幸福和满足。由六师之一的末伽黎·拘舍罗创立的生活派，反映了古印度下层人民的消极人生观。生活派推崇命运，认为在命运面前人和人的灵魂不能有任何自由意志和作为。他们信奉的格言是：“一个人能抹掉身上的油垢，但谁也不能除去命运中的缚系。”

在古印度人学思想史中，佛教经典中的人学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印度佛教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教时期。原始佛教是指释迦牟尼创立的形成部派佛教之前的佛教总称。原始佛教的人学思想是佛陀围绕人生的诸多现象展开的一系列反思，它重实用而不重思辨，强调通过实际可行的戒定慧的修道方法，除去人因生老病死而产生的忧虑与烦恼。它认为，人间的苦难是由于人无知无明所造成的业力报应，这样就把人世的苦难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消除这种苦难的方法也就归结为

个人的自我克制、自我修养，人按照戒定慧三种方法修行，就可以摆脱苦难。这就是说，人要消除苦难只能求诸自我净化，而不能求诸社会改造。佛陀劝导人们在现世的苦难面前采取容忍和克制的消极办法，目的在于得到来世的解脱。这显然是面对苦难无力反抗的人所采取的消极方法，只不过采取了思辨玄奥的逻辑推理的方式加以装饰而已。所以，总的说来原始佛教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佛陀死后，统一的佛教发生分裂，由于对戒律和教义的解释不同，形成了佛教不同的部派分支。随着佛教的扩展，佛陀也被逐渐神化，成了三界的导师、人间的救世主。大乘佛教是印度奴隶制衰落、封建社会开始兴起时形成的一个佛教分支。大乘佛教将人与佛陀的关系认定为人神关系，宣传神异和偶像崇拜。它认为人我空，法我空，一切皆空，在修行中不但要破法执，证我空，而且要证法空。这里所说的“空”不是空无所有，而是指不可描述，没有任何规定性。大乘佛教表现出强烈的玄学倾向。大乘佛教后来形成两个派别：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它们围绕“空”展开对人生、人性与佛性、涅槃、修行等问题的阐述。大乘佛教中也包含一些可取的主张。例如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这是以曲折方式反映了人对平等的向往。密教形成于佛教发展的后期，大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形成，它把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结合起来，并吸收了一些新婆罗门教的思想，创造自己的教义。佛教在印度前后流行了1500多年，公元10世纪开始衰落，13世纪湮灭。但它对人的今生来世、人的灵魂、人的社会生活伦理、人生苦难、人生目的等问题的主张和复杂、玄奥、思辨的论证，对后世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尤其在亚洲各国，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佛教信徒，可见其影响之久远。

古希腊文明最早出现在地中海中的爱琴海周围，史称爱琴文明，其中心在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城，所以又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克里特岛出现最初的城邦国家，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爱琴地区的上古文明共存在800年。接着希腊历史进入荷马时代(公元前11~前9世纪)，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就

是荷马史诗。

古代希腊人学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希腊人学、中期希腊人学、晚期希腊人学、罗马时期人学。

早期希腊人学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的人学。这时希腊文明的中心不在希腊本土,而是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以弗所、南意大利的克罗顿等地。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等就是小亚细亚最初的哲学家。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即哲学本体论问题。他们也对人的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看法,他们从其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对人的起源、人生目的、社会生活规则等做出了唯物主义的回答;但这种研究多是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出发,把人看做一种自然存在,认为人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种,服从自然规律,没有把人当成不同于自然物的社会人来研究。这个时期的另一支哲学代表是南意大利城邦克罗顿的毕泰戈拉派,他们主张人的神创论,认为“灵魂不死”、“转世轮回”,人生的最高理想是使灵魂摆脱肉体。这些思想显然是受到埃及、巴比伦宗教思想的影响。

中期希腊人学指希腊古典时期的人学,时间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这个时期希腊文明中心已转到希腊本土,城邦奴隶制得到空前的发展,达到极盛,其代表便是雅典城邦的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真正的古希腊人学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由于各城邦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极大地削弱了各城邦的力量,最终使希腊城邦制走向衰落,公元前337年北方的马其顿征服了希腊各城邦,辉煌一时的城邦制归于灭亡。这个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古希腊哲学进入空前繁荣、交替发展的时期,古希腊人学思想也进入五光十色的发展阶段。一方面,自然哲学在继续发展,日臻完善,经过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论,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古希腊自然哲学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从这种自然哲学立场出发,他们对人进行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另一方面,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希腊哲学研究的重点从

自然转向人及人的社会,于是出现了人学的开端篇:智者派的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两个命题标志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人学的诞生。人成为万物的中心和存在的惟一尺度,从哲学高度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已经正式由苏格拉底提出来了,即人应该认识你自己是谁。柏拉图沿着苏格拉底的思路,提出了较完备的关于人的各个方面的学说;亚里士多德则吸收了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和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精华,创立了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丰富的人学思想。这个时期古希腊的人学思想在整个世界人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后来的许多人学流派,特别是西方近代的人学流派的思想渊源,大都起源于这里。

古希腊晚期又称希腊化时期,一般指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开始,到公元前146年希腊本土被罗马征服为止。从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到公元前325年东征结束,经过数年征战,他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流域,南到埃及,北到中亚。东征给东方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客观上推动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希腊文明扩展到帝国的各个地区。埃及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是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规模宏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聚集了世界各地的大批学者。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理学、医学等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发展。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阿基米德发现的“阿几米德原理”、阿里斯塔克的“太阳中心说”、埃拉托斯特尼的“地圆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明成果。但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却充满了动荡、战乱,世风日下。在奴隶制衰败的过程中,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到恐惧、疑虑和不安。面对逐渐崩溃的社会现实,奴隶主已经无力回天,于是他们便转向内心,求得灵魂的宁静。他们追求的已经不再是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而是寻求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提供各种途径和理论使人苟活命于乱世,内心平静地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成为这个时期人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伊壁鸠鲁把身体健康、灵魂宁

静看做人生幸福的极致。斯多亚派认为,人应选择理性的生活,克制情欲而达至善。怀疑派的首领皮浪则主张并力行冷漠淡然,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的行为准则。

古罗马时期的人学思想,是指从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希腊起,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这一时期的人学思想。古罗马奴隶社会是古希腊奴隶社会的继续,因此,古罗马的哲学、人学思想也是古希腊哲学、人学思想的继续。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古希腊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而折衷主义、新斯多亚派、新怀疑派、新柏拉图派则是古希腊柏拉图等各种唯心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古罗马的人学思想是古希腊的人学思想的继续,但已经打上淡淡的罗马烙印,这主要是由罗马的政治和文化影响造成的。希腊哲学的自由的理性主义的光辉逐渐衰弱,神秘主义的色彩逐渐增强,而在帝国结束前出现的教父学,已经成为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前驱。人学已逐渐远离理性,走向宗教和神秘。

上古中国人学,是指先秦人学思想。它大体包括三个阶段:殷周人学、诸子前人学、诸子人学。殷周人学包括殷商和西周两代的人学思想,主要是西周的人学思想。根据近年来的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商汤建国于公元前18世纪,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4世纪初,商纣亡国约在公元前12世纪末。商代前后存在600余年。^①殷商处于奴隶制时代,“成汤时期的国家权力已经初步确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亦已稳固。”^②国内有完整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军队。这时的农业、畜牧、养蚕业和渔猎业都很发达。殷商人已经掌握了冶炼青铜的技术。商代已有天文历法:一年有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用闰月的方法调整一年的总天数。商朝已广泛使用甲骨文,它经过由象形到形声的发展过程,到殷商晚期已成为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殷商时代宗教迷信十分盛行。“帝”或“上帝”被看做天上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3卷,第216页。

② 同上书,第232页。

的最高主宰，不仅管自然万物、风雨雷电，也管人世间的一切。在殷商人看来，死去的先公先王升到“上帝”左右，俱有与帝差不多的某些权力。所以他们十分重视祭祀先王先公，以图获得庇佑。占卜术十分盛行，气象、农事、吉凶、灾害、家族、行为等等，均依占卜，预测未来，决定行止。殷商人还没有形成自我的意识。西周灭商之后，强化了国家机器，建立了宗法和礼制。在精神领域宣扬敬天保民的思想。周人不像殷人那样迷信，他们采取敬天命、尽人事的态度。西周奴隶主贵族从商朝灭亡和周初政治动乱中吸取了教训，懂得了“天命无常，民意才是现实的道理”。周公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的思想。这种天命依人的德行而转移的思想，在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增添了人的影响，这是对殷商人的“帝”或“上帝”观念的变革，反映了人神关系中的人的理性觉醒。

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前 476)，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革。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势力渐大，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的经济实力的不同，导致诸侯之间为争霸业连年征战不断，各国国内也为争夺统治权而政治斗争不断，奴隶制走向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铁制器具的使用，农耕技术的改良和水利设施的修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楚晋等国已开始设立郡县，华夏与周围各少数民族逐渐融合。在政治经济变革的推动下，“天命”神权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诗经》中已出现了责天疑天的思想，接着出现了强劲的无神论思潮，这就是春秋时期的人文思潮，先秦人学进入第二阶段，即诸子前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管仲、子产、季梁、叔浴、史嚣等。在春秋时期的人学思想中，人被提到首位，成了讨论的中心，神被放在次位。“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夫民，神之主也”，“吉凶由人”，这些思想都突出了人的作用，贬低了神的权威。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得知？”这里明确提出了“人道”的概念，并把它与“天道”相对应。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排斥了鬼神占卜在人事中的作用，把天、神自然化。他们还把“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当做人应追求的